



平阳县西北部群山连亘，峰峦叠翠，其中的风岭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因为在它的南麓，曾有一所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这所学校，八十八年前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他们怀揣共同的理想，跋山涉水来到风岭，投身革命的熔炉中。在这些革命青年里，有多位后来成为著名的文艺家，如九叶诗人唐湜、小说家林斤澜和版画家林夫等。“革命”与“文艺”，是他们一生的关键词。

一

眼前的风岭山树木萌绿，花草争艳，是诱人的景色。而据唐湜先生晚年时回忆，风岭给他的印象是山色苍黄、草木萧疏，呼啸而过的山风又冷又劲。时间回溯到1937年。17岁的唐湜对文艺充满浓厚的兴趣，研读了中国诗人徐志摩、何其芳的作品，也研读了俄国诗人普希金（普式庚）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还写下了100多行的长诗《普式庚颂》和一篇关于狄更斯的评论，发表在校刊上。那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正在宁波读书的唐湜听说家乡温州瓯江口外的黄大岙岛已被日舰盘踞，成为攻击温州的根据地。灾难就要降临家乡，唐湜心急如焚，他没有心思再在宁波上学，背起行李便向老师、同学道别，回到温州。

他认为革命需要文学，文学要倾心革命。1938年元旦，他在温州城区遇到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办事处主任吴毓，得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要在平阳开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为浙江培养革命干部的消息。吴毓负责招生工作，希望唐湜入校学习。唐湜正苦于报国无门，机会难得，他当即答应。他去找林斤澜，想动员林斤澜一同参加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此时林斤澜只有14岁，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林斤澜也已报纸上看到了招募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员的广告，他认为当前形势下，奔赴抗战一线是进步知识分子最直接的选择。

1938年1月15日，唐湜、林斤澜告别了家人。在吴毓的组织带领下，共有70多名温州城区青年学生，浩浩荡荡地前往平阳山门，其中还有后来成为林斤澜夫人的谷叶。

他们先坐小火轮，再爬山走夜路，在晨光微露时到达风岭山，成为第一批到达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学员。

二

面前的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旧址是一栋七间二层木构楼房，经过多次修缮，占地210平方米。校园里，九棵桂花树均高过屋顶，一片葱茏。据唐湜回忆，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舍坐

落在幽静的山野间，楼房旁边还有厢房，组成“U”形，围着一棵重阳木，重阳木宽大的叶片挺立在山风中。

当时，学校里共有两百余名学员，都是满怀爱国热情、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大部分来自温州城区，也有来自处州（今浙江省丽水市）、台州等地的。干校校长是时任闽浙军区司令员的粟裕。1935年开始，粟裕建立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学员对这位共产党人非常崇敬。在干校开学典礼上，时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的刘英作了动员讲话。1936年，刘英在福鼎、泰顺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建立浙南游击根据地。唐湜眼前的刘英，身材高瘦，面容清癯，举止文雅，虽然是江西人，却能讲一口流利的浙南方言，讲话思路敏捷，满怀激情。

干校开设哲学、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四门课程。粟裕亲自讲授游击战术，现身说法，讲了很多战斗故事。唐湜、林斤澜以前没有接触过这四门课程的内容，听起来有些吃力，但他们凭着刻苦和聪明，学到了不少新知识。

干校像个大家庭，干部、教员住在木楼上，晚上打地铺睡觉；学员们则住在学校附近的一间破庙里，也打地铺睡。清晨，军号声一响，学员们便起床操练、学习，课余时间丰富多彩，教员和学员一起唱歌、演戏、登山、夜行军，还有动真格的演习训练。这里山峦绵延，天空高远，他们怀着报国热情，像山风一样，奔跑在天地之间，充满生命的活力。

转眼就要过年了，美术教员林夫提议在学校出一张大墙报迎接新年，他选出10名编委，其中就有林斤澜和唐湜。编委各有分工，有的写文章，有的画报头，有的剪红条，有的刷糨糊。一天下来，一幅占据着大半个墙面的墙报完成了。正月初一，全体学生放假，有的回老家拜年，有的到山上玩耍，而林斤澜和唐湜悄然走下山，来到山脚下的畴溪村，跟村民讲抗日的道理。

林夫那年27岁，唐湜见他总不顾山风凛冽刺骨，在学校礼堂画马克思和毛泽东像，在畴溪村街头绘制抗日壁画。他话语不多，只知道默默工作，唐湜和林斤澜喜欢与他亲近。有一次，林夫从怀里拿出一张自己与鲁迅的合影给唐湜和林斤澜看，并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与鲁迅先生一起座谈又留下合照，实在难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光荣的事情。”唐湜和林斤澜看着照片，林夫坐在鲁迅先生左侧，正在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这更让唐湜对林夫产生了一种好奇心，崇拜的感觉油然而生。

林夫受鲁迅先生的感召，一直在创作反映劳动人民苦难与抗争的版画作品，发表在抗战画报上。1937年年末，任干校副校长的黄先河在地下党员中物色一批人担任教学工作时，想到在上海

有过交往的青年版画家林夫，托人邀请他前来从事美术宣传工作。林夫欣然答应，到干校向黄先河报到后，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干校没有美术课，我来干什么啊？”黄先河说：“美术是一种强大的形象教育武器，学校抗日救亡宣传，没有美术可不行。”就这样，林夫负责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美术宣传工作，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

黄先河也很欣赏唐湜，觉得他老实本分，又能写一手好文章。唐湜的党组织关系正是在黄先河为书记的支部里。在干校教员中，唐湜还与教务长黄耕夫关系亲近，他是风岭山附近的凤卧乡凤卧湾村人，时年28岁，对教学行政工作认真负责，对学员充满了家长般的爱心和耐心。在学校里，唐湜还认识了黄耕夫的老乡黄兆高，他既不是学员也不是教员，但为人正直，特别向往革命，经常来干校与学员交朋友，也跟唐湜交流凤卧一带的抗战信息。

三

过完了年，春天来了。大山深处的早春，时有阴雨，寒风刺骨，学员们夜以继日地学习，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里，在冷风冷雨中孕育胜利的曙光。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林斤澜和谷叶、唐湜一起坐在校外的草坪上晒太阳，看着蓝天上悠闲飘荡的白云，一种情绪撞进了他们的心理。谷叶问林斤澜：“给家里写信没有？”林斤澜答道：“写了。”又问：“写了几张信纸？”答：“两张。”旁边的唐湜问：“你们想家了吧？”谷叶高声道：“我才不想家，为什么想家？”林斤澜在草地上打一个滚，也高声道：“对，对，这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没有比这样更快乐的日子了。”

有一天，通信员突然来找林斤澜，说是粟裕司令要与他谈话。林斤澜跟着通信员走出学校，走了一段山路，来到一个小庙里，见到了住在庙里的粟裕。粟裕让林斤澜坐下，温和地说：“过两天我要带一支部队去皖南，打算带走30来个男学员，你愿意跟我走吗？舍不得家？”他还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告诉林斤澜去皖南要经过什么地方，要走多少天。林斤澜有些意外，心中交织着兴奋和激动，郑重地说：“愿意跟着您走，舍得家的。”粟裕问：“身体好不好？”林斤澜连忙挺起胸，绷紧胳膊，说：“身体好的。”粟裕又跟他说了一会儿话，他边听边想着自己正值青春韶华，还从未上过战场，到战场后一定要好好表现。

按照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1938年3月中旬，粟裕要率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奔赴皖南。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结束办学，3月15日，学员们提前结业，也昭示着他们新征程的开始。

我多次在干校旧址寻找学员们留下

四

干校部分学员跟随粟裕奔赴抗日战争前线，曾准备好上前线的林斤澜却留了下来，转入了地下斗争。原因是干校领导班子考虑到他文化水平较高，集写作、编报、表演等才能于一身，最终研究做出了这个决定。

林斤澜被安排在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抗日流动宣传队里，他和20多名队员在干校教员连珍和林夫的帶領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在平阳、泰顺、瑞安等地进行抗日救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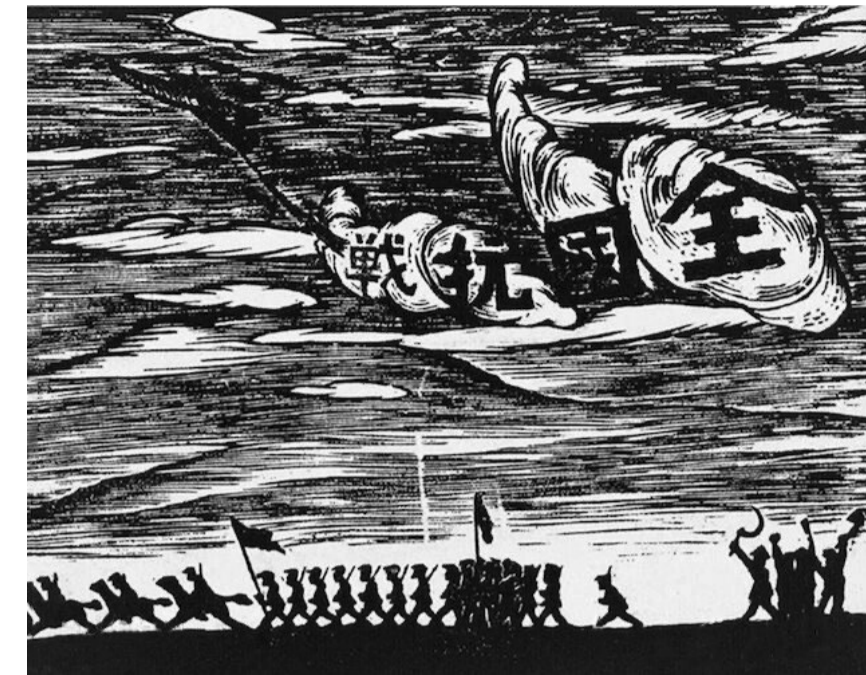


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旧址

巡回宣传。1938年5月宣传队解散，林夫留在中共平阳县委工作，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等职。林斤澜则受组织安排，前往温州和台州交界的山区，协助中共台属特委军委将永（永嘉）乐（乐清）黄（黄岩）三县边界的群众武装联合起来，整编为黄乐边抗日游击队。

也留下来的唐湜从干校结业不久，便接到黄先河的来信。信中说，他已去了延安，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希望唐湜也去延安。革命圣地延安，是唐湜无比向往的地方。1938年严冬，唐湜相约小姨王静香、表兄陈桂芳，从温州启程，前往远在千里之外的延安。

在唐湜先生晚年时，我与他成了忘年交，我经常到他温州花柳塘的家里做



全国抗战（版画）林夫作

路，前往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这是一栋六开间二层木结构楼房，坐落在冠尖山山坳里，掩映在青松翠竹中。八十六年前的盛夏，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栋房子的二楼秘密召开，掀开了浙江党史崭新的一页。会上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浙江省委，刘英同志任书记。

顺着凤卧溪岸，在绿荫与波光中穿行，感觉不到炎炎赤日，吴潭桥边的水尾宫就在前方。水尾宫是三间木结构平房，如今挂牌吴潭桥村文化礼堂，同样是珍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存。

1938年3月18日，春风劲急、红旗猎猎，500名将士在风岭山集结，由粟裕率领到水尾宫召开北上抗日誓师大会。将士们誓言铿锵，嘹亮的抗日救亡口号在凤卧盆地上空回响。当天下午，部队在粟裕率领下出征，将士们在欢送人群的簇拥下，沿着清澈的凤卧溪前行。唐湜也挤在送行人的队伍中，他看到出征队列中的黄兆高——黄兆高已参加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这支部队经温州、处州等地，到达皖南岩寺镇，改编为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

在抗战岁月里，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大多数学员和干部，教员到浙江各地，或公开或秘密地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大多数成为党政军及各条战线的骨干。林夫牺牲于1942年，而唐湜、林斤澜则在革命队伍中逐渐成长为优秀的革命战士和作家。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就像中华大地上无数曾存在过的抗战摇篮，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培育了众多不惧牺牲、奋勇抗争的中华儿女。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矗立起了一座又一座的丰碑。

五

这一次来平阳，我还有另一目的，便是重走红军走过的路。我随着脚下的山岭起伏，用了近4个小时，经西山、大屯、马头岗等山头，到了凤卧镇凤林村。山风掠过，我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有草木的清香。我沿着铺着红色塑胶的山

一把大刀的重量——郭澄清与他的《大刀记》

□胡世宗

卷，自制书架上堆满资料。宁津的寒冬里，水瓮结满厚冰；炎夏时，蚊虫肆虐。郭澄清裹着棉被写作，头靠土墙沉思，竟在墙上磨出油亮的印记。更艰难的是他的带病之躯——陈旧性心梗、肺结核、阵发性阑尾炎时刻威胁着生命，病发时他吞下急救药继续执笔，因困难即便以辣椒提神，甚至用冷水浇头。

郭澄清的写作桌旁始终围绕着三类“老师”：抗战老战士组成的“顾问组”，给他提供真实的战争细节；农户乡亲组成的“参谋组”，帮他打磨人物情感与方言表达；他身边那些爱好写作的业余作家组成的“挑刺组”，大胆地帮他雕琢文学技法。

黎明时分，他常独自在村北田野踱步，在玉米地与沟坎间凝神驻足。那里曾是抗日大刀队神出鬼没的战场。据村医郭治明回忆，“他两眼呆呆望着庄稼陷入沉思，我不敢打扰他进入角色”。这种近乎苦修般的创作持续了三年，郭澄清终将个人记忆升华为民族史诗。

刀锋上的舞蹈：《大刀记》的诞生与涅槃

1972年，《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完稿，却因故被搁置。郭澄清顶着

压力续写80余万字的第二部。1975年，正值纪念抗战胜利3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紧急召他进京修改文稿。在出版社红砖小楼仅几平方米的房间里，责任编辑谢永旺回忆说：“最多时一天发稿三四万字。”那可完全是用手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呀！

1975年8月，《大刀记》三卷本正式出版，顷刻间掀起阅读狂潮：在半年的时间里发行300万套，创下了当时的出版奇迹；连环画版本更横扫全国，总印量突破3000万套。这部小说受到人们的喜爱，20余省出版社争相重印，电影、话剧、评书改编遍地开花，薛中锐的评书《大刀记》更是成为千家万户的“听觉盛宴”。

刀魂不朽：血写的经典与永恒的丰碑

《大刀记》以梁永生从复仇者到革命者的成长轨迹，勾勒出鲁北平原半世纪的烽烟画卷。小说开篇题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潭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仙”与“龙”正是千万不屈的民众精魂。郭澄清将侠义精神与革命叙事熔铸一炉，主人公莽撞刚直的性格，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从“草莽义

在文学史上，一个用生命书写抗战记忆的身影巍然挺立。

1975年9月3日，在北京某招待所一个清静的房间里，我欣喜地接过郭澄清先生赠送给我的三卷本《大刀记》。这部巨著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到一个月。作者提笔在每一册的扉页郑重写下“敬请胡世宗同志教正”；落款墨迹深沉，“郭澄清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

“九月三日”！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纪念的日子啊！那时我未曾想到，手中这部还散发着油墨香香的抗战巨著，竟是一位作家用生命最后的健康时光铸就的文学丰碑——仅仅八九个月后，他便因脑血栓倒下，半身瘫痪却依然坚持创作，直至生命的终点。

从烽火中来：一个作家的精神烙印

郭澄清的文学血脉深植于鲁北平原的血与火之中。1929年生于山东宁

津县贫苦农家的他，少年时便亲历了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1948年，19岁的郭澄清穿上渤海军区渤海纵队的军装，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中目睹战友的壮烈牺牲。一位连长在弥留之际将染血的钢笔交到他手中，说：“小郭，你很会写文章，你用这支笔把牺牲的战友们的事迹写下来，交给他们的后人。”这句话如同灵魂的烙印、庄重的遗嘱，让不满20岁的郭澄清立下了为民族存证、为英烈立传的决心。

战火停息后，这位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年轻战士做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放弃省城教育厅的职位，主动申请调回家乡宁津县。1950年起，他担任宁津县直属完小学校兼一中教导主任。白天教书育人，夜晚伏案疾书，他开始系统收集家乡的抗战资料。在油灯摇曳的光影中，他完成了10万字传记文学《马振华英烈传》，深情记述了在宁津牺牲的冀鲁边区抗日英雄马振华的事迹。这部未能及时出版的遗珠，正是《大刀记》最早的初稿。

土屋孤灯：百万字史诗的淬火锻造

1971年秋，已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郭澄清做出惊人之举：辞别环境优越的省城济南，回到宁津县郭皋村的老宅。大家不解其意，他的回答朴素而深刻：“我是写农村生活的作家，只有在农村与农民共命运，才能写出好的作品。离开农村，就等于鱼儿离开了水。”

迎接他的是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土坯房。屋内陈设寒素：一张吱呀作响的破八仙桌，一盏煤油灯，门板上铺着被

